

性

学大师

詹姆斯·琼斯 著
James H. Jones
赵万鹏 译



ALFRED C. KINSEY

阿尔弗雷德·金赛

传 下册

美国诺顿出版公司
独家授权

经济日报 出版社

性

学大师



ALFRED C. KINSEY

阿尔弗雷德·金赛



性学大师

第三部

亲眼看到这么多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的事真让人高兴。原来我总是畏惧阴茎的行为，现在觉得它简直太妙了。



结婚几年后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夫妻间的性生活会越来越和谐，而且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婚姻课程”

到 30 年代末，金赛陷入了困境。在职业上他遭受挫折，受到低估，印第安纳大学的状况令人难以容忍。在标有“绝密，先生！毁掉它”字样的一封信中，他于 1935 年向研究生院的老朋友埃德加·安德森吐露了内心的愤慨：“整个大学一片混乱，除了古老的惯例外我们一事无成，一有可以补偿和研究的机会我就离开。”金赛把大学的状况归咎于年迈的威廉·罗威·布莱恩。他说，“所有这一切都由于我们的校长已经 75 岁高龄的事实，他不愿意解决任何问题，无论大小。”

1937 年春，维多利亚时代突然地即便是迟到地放弃了对印

印第安纳大学的控制。校长布莱恩于6月退休，结束了对校园的长达35年的封建统治。他的离任伴随着新近通过的州政府支持的大学教授退休制度，导致一大批老年教师的离职。布莱恩一走，领导体系也濒于垮台的边缘，大家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董事会任命商学院院长赫尔曼·B·威尔斯为代理校长（“B”并不表示任何意义）。

这位了不起的人的显著特征是年轻。赫尔曼·B·威尔斯在35岁时的授职仪式使他成为学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威尔斯是印第安纳人，一表人才。他身材矮胖，膀阔胸宽，一颗大头上长着卷曲的黑发，一撇八字胡整齐潇洒。他笑声如雷，而一丝微笑又能融冰化冻。他诚挚迷人，具有天生的政治家的热情和魅力。

威尔斯在印第安纳的利巴嫩长大，父亲是个银行家，母亲在学校教书。在利巴嫩高中毕业后，威尔斯就读伊利诺伊大学，但在一年级结束时离开那里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在这里他获得商管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他又到威斯康星大学研修商管博士学位。1931年，他离开威斯康星，没有完成学业，回到印第安纳大学作经济学讲师。即便他乘坐火箭的话，也不可能比这更快地连连晋级。几年内，这位神童就升为商学院院长，当董事会任命他为代理校长时他正担任此职，此时他任教还不到7年。

就个人情况来看，威尔斯与布莱恩形成了鲜明对比。威尔斯是个单身汉，以享乐著称。大学时，他曾加入西格马奴，高年级时被选为著名的指挥官。“我想我对兄弟会的生活有一种天生的爱好。”他后来承认说。威尔斯当然指的是对志同道合的团队精神的喜爱，但他也承认对无休止的派对的厌烦，而这又正是希腊生活的主要特征。在禁酒的高潮期，威尔斯和伙伴们经常光顾附近的非法酒店，他在那里消费掉那份家酿白酒。此外，他还经常

参加周末旅游队，去芝加哥听南方夜总会的爵士乐。由于他的团队精神出了名，威尔斯后来感到有必要将其写入回忆录：“与校友的生动回忆相反，他们的回忆总是不符合事实，我在大学时代既未戴过熊狸帽，也未穿过熊皮外衣。”

然而，对一个尽情享乐的人来说，威尔斯的社会生活却奇怪地缺少一点什么。在自传《幸运》中，他提到高中时期的约会和舞会，但在大学时代却无提及。同样，威尔斯对于他的老年生活的叙述在浪漫的方面也是沉默的。父亲死后，他与母亲一起住在校长府第，母亲成了他处理大学事务的女主人。显然，他是位喜欢其他男人陪伴的单身汉。

不管个人兴趣是什么，威尔斯都是位天生的领袖。果断，精力旺盛，和蔼快活，有明确的工作计划。由于董事会是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才任命他为代理校长的，所以威尔斯在上一代人中的坚定分子最终离任之时掌握了大权。他们的离开为雇佣年轻有为的教师提供了机会。这就是威尔斯之所为。他与教师中的骨干联合在一起，直接参与寻找教师的工作，以便保证高质量。

从上任之日起，威尔斯就与布莱恩的学术封建主义保持距离。他不是嘉奖年老的和忠实于他个人的教师，而是强调学术和教学。他致力于学术自由，把大学看作学习和开发新思想的中心，是教师能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地方。D 威尔斯也是位精明的政治家，认识到与不同的团体联合的必要性。他意识到一位大学校长应该一碗水端平，便努力诚实而公平地代表学校不同人的利益。比如，在为重要的机构选择人选时，威尔斯任命自由派、中庸派和保守派等各方人士，这样就能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

全体教师都支持威尔斯的任命。到处洋溢着乐观和希望，人们普遍认为这位年轻的校长能够领导印第安纳大学走向光明的未

来。教授们都急于把布莱恩时代的挫折抛在后面，进而提出了各种促进大学进步的建议。比如，金赛的所在系就表现出明显的生机。在布莱恩在任的最后5个月里，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公共工程署拨来联邦建筑基金，这是两项著名的恢复工作的新政计划。感到时间业已成熟，金赛和同行们给裴因院长施加压力，向这些机构申请基金翻修老生物楼的坍塌部分。

印第安纳大学得到了基金。到1938年春，翻修已在进行。“我不得不监工，”金赛在给俄里斯的信中说，在整个春季学期裴因院长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校内。金赛还细心地注意到运动学和植物学图书馆已合并并在老运动学讲厅，而老植物学讲厅现为大家所公用，还有一些其他空间分配也作了重大改动。此外，该系还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即新的实验设备，包括“许许多多新肥皂盒、废品篓、毛巾架、桌子、椅子”和“1800美元的新显微镜”。金赛还说，“拼命工作，树立大目标，而非接受小恩小惠，肯定会有回报的。我们最终说服裴因博士去追求这些事情——他为得到它们而感到惊奇。”

威尔斯具有笼络骨干教师的天才。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组织一个特殊委员会对大学进行自检调查，从而提供关于学校目前所处地位和需要的准确信息。消息马上传开，赫尔曼·B·威尔斯有意用校园的精英组织这个委员会，应该请金赛参加委员会，“因为他在收集和大量实际信息方面具有坚持不懈的客观性和能力”，以及“他那人人都知的广泛的兴趣”。克罗克说：“我在许多问题上与他见解不一致，但我钦佩他的非凡能力和客观性。”克罗克还诚实但有些过急地说：“他有些直率，有时不讲策略，但重要的是，如果启用他，他将构成合适的组合。”金赛未进入委员会，但他对委员会的工作予以密切关注。“我们有一个教师调查委员会，”他写信给俄里斯说，“他将动摇一切事物的根

基，不顾惯例——与我同龄的人——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将是这次重新组合中的骨干。”

金赛对委员会抱有信心是对的。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像一颗重型炮弹击中了校园。这份报告是对布莱恩时代的一次控诉，罗列了布莱恩灾难性治校的方方面面。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布莱恩组织的教师队伍都是软弱的。据委员会所说，1938年他们的同行中只有48人进入《美国名人词典》，还有一些进入该词典的人现在已不是该校的教师了，已于前一年辞职或退休。而在十大校中，威斯康星大学有155人，密执安大学有153人。

同样令人失望的是对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生项目的评定。重温美国教育署研究生教育委员会1934年的报告，自检委员会发现印第安纳只有十个系具有充足的学术力量维持博士点项目。在这些系中，没有一个获得“非常合格”的评价——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这种低评价是预料之中的，因为研究活动的实力决定学校培养博士生的资格。而如果研究意味着出版，那么，印第安纳的教授们则未尽其职。

在关于教师队伍的报告的结尾，自检委员会承认印第安纳大学有许多有能力和若干著名的教授。“然而，从整体来考虑，”报告寡情薄义地说，“事实上印第安纳的教师决不是著名的。无论从什么样的证据推理，事实显然是，印第安纳没有资格与中西部的其他州的大学相比肩（普渡大学除外），更不用说这个国家的名牌大学了。”如果说印第安纳大学仍有改善其地位的希望的话，委员会断言，那就必须“采取根本措施，为学校获得和保留著名和多产的学者，为学术工作提供足够的设备和鼓励。”其意思很清楚：如果新的管理部门不保持和支持骨干教师，招收有能力的研究工作者，印第安纳大学就将仍然在学术上处于十大校的末流。

威尔斯努力结盟、收集有关学校之需要的信息之时，金赛则持“等等看”的态度。“我还未决定在这里谋求前途，”他于1938年3月写信给俄里斯说，“如果这次改组结果很好，印第安纳大学就是个好留的地方；如果事情弄成了一团糟，那我就到市场上别谋他职。总会有地方进行活跃的遗传学研究，和允许进行生物分类学—细胞学—遗传学基础研究的研究生项目的地方的。也许我们能在这里建立一个。”

从金赛的角度看，一切都依赖于董事会任命何人为正式校长。当然，一般的选择是很容易的，董事会只需任命一个与布莱恩一模一样的人，一个能保持现状的人。如果他们想要改善大学的状况，那么，他们就要找一个大胆的领导——有远见、高标准、有准确的判断力，并有策略和勇气，这是组织一个真正的精英领导班子所必需的，此外，还需有为其财政拮据而从州立法部门索要额外基金的政治手腕。

在进行八个月的考察之后，1938年3月22日，董事会任命代理校长威尔斯为印第安纳大学第十一任校长。全体一致通过，反映了董事会的坚定信念：这位36岁的单身汉是恰当的人选。“你年轻，有雄心、勇气、能力、和高等的智慧，”董事会主席写信给威尔斯说，“有了这一切你不会失败的。你必须、你一定能成功。”在接受任命时，威尔斯承认他感到“完全没有能力胜任这项重要的任务。”但他许诺：“我要尽最大努力——我要把我的思想和精力全部献给这项工作。”

威尔斯发放出信任和能量。他把威斯康星大学和密执安大学作为样板，着手建立所谓的现代巨型大学——庞大的、公众支持的、多方面的、以研究为指向的、拥有不仅仅具有很强的本科教学能力而且是发表作品的专家和要求严格的研究生导师的著名教授的大学。要达到这一目标，威尔斯需要学生、教师、同行和董

事会的支持。他采取措施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D 威尔斯宣布他欢迎新的想法。他知道，在布莱恩的最后几年里（有人说是他垂死的岁月）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要以“行动者”的身份赢得人们的信任，利用学生和教师的努力建设一座更好的大学。为了证实新校长的誓言，一伙具有改革精神的本科生马上对威尔斯进行考验。他们厌烦了严格的社会控制，决心探讨前任学校管理机构认为不体面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性病。

就在威尔斯就任校长前不久，学校报纸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印第安纳大学的全体学生进行一次瓦色尔曼检查。响应首席外科医生托马斯·帕兰进行全国范围检查的号召，《学生日报》于1938年2月15日宣告展开“对全体印第安纳大学学生进行检查的行动”。自封为致力于“一个更伟大、更进步的大学”的“一份向前看的自由报纸”，这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大胆宣称，他们的职责是“率先行动”。他们坚持认为“大学应该支持这项事业”，因为他们“是铸造未来几代人的实验室”。他们承认性病可能不是校园的主要问题，但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印第安纳大学是否“通过对这种疾病采取坦率无畏的态度而加入到消灭性病的行列。”

除了几个例外外，大多数教师都采取隐蔽的策略，而非加入到那个行列。金赛和他的大多数同行一样保持谨慎的沉默。但还是有一位教授表示支持。社会学系的哈威·J·洛克在许多社会问题上都采取自由态度，并因此而闻名全校。他对一位学生记者说，他正在进行一项美国和国外性病的调查，尤其强调要求进行婚前验血的法律。洛克虽然在就要加入学生运动之际突然打住，但他通过把注意力引向他自己的研究领域而给予这场运动以缄默的支持。

一位当地的卫生官员的确支持了这场运动。J·E·P·霍兰德是市政卫生部的一位官员，他对《学生日报》的一位记者说，他赞成学生进行瓦色尔曼检查，并指出许多大学，包括哈佛和邻近的伊利诺伊大学，都已经提供了这项服务。“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他写信给报纸编辑说，“即使失败了，它也能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但我希望你们能成功。”

但胜利是绝没有保证的。社论刚刚发表之后，《学生日报》就响彻一片抱怨声。有些批评家谴责报纸编辑小题大做，或为大学的名誉抹黑，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检查没有必要。编辑们不但没有退却，而且反击这些批评家，重申他们进行瓦色尔曼检查的要求。转机出现了，医学界的有力同盟赞成这场运动，主动提供援助。当消息传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州卫生部主动对大学送来的血样进行免费检验。事实上，卫生部官员沃纳·K·哈威透露说，印第安纳的劲敌普林斯顿大学已经接受验血多年了。到5月份，印第安纳大学的验血活动开始了。《学生日报》骄傲地报道，“一千多名学生已经免费验了血。”

“我骄傲地看到《学生日报》发动的瓦色尔曼验血运动，读了那些一用坦率的语言——关于性病的讨论。”一位学生写到，“但我感到《学生日报》要做的下一件事就是要求学校招聘精神分析学家，”这位学生继续说，“太多的大学生为担心、恐惧、焦虑、沮丧的情绪所困扰；太多的大学生屈从于仇恨、自卑感、自怜和优越感。”

由于痛苦地意识到性冲突使许多学生感到焦虑和恐惧，其他学生要求学校开设现代性教育课。就在《学生日报》发动瓦色尔曼验血运动的第一天后，编辑们就开始接收来自抱怨的学生的信，抨击性教育的可怜现状。“卫生……是大学里最无用的课程，但却能改变成最有用的。”一位沮丧的学生抱怨说。学生们学到

的不是卫生，却“由于无用的医学术语和课上的批判和闲聊而恨这门课程”。另一名同学同意这种说法：“在整整四年里，我只上了一堂卫生课——一个小时的卫生课。”他叹道：“尽管总是想要知道是什么支撑着人类身体的运动。但在印第安纳，这门课程是失败的。”

这种抱怨并未夸大其实，为了与校长布莱恩的观点保持一致，印第安纳大学的性教育课是绝对地正统。所谓的性教育只不过是称作“卫生”的一个小时的必修课。实际上，这门课程共分两种：一种为男性，另一种为女性。回顾本科生的岁月，沃德尔·波默罗伊回忆说，“二年级时，我与其他厌腻的男孩们（不许女孩子参加）修了这门课，我们听到了那些老生常谈的下流玩笑，但没有人笑，还有那些显然不对头的但在1932年的讲堂上却是典型的错误信息。”

女性的卫生课也不见起色。在30年代深受其害的塞西莉雅·华尔说：“大家都讨厌这门课，认为是个大累赘，并想方设法开它的玩笑。”她特别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校长布莱恩向女生做一次题为“集中与松弛”的重要讲演，今天会将其称为“紧张控制”。他建议消除焦虑的方法是极其简单的。“当我感到不能入睡的时候，”他叹息道，“我躺着，想着我所认识的所有约翰们。”华尔咯咯一笑，又说。“亲爱的布莱恩博士不知道大厅里为什么哄堂大笑。他竟然是一位温和、博学、用词准确的学者。”

校长布莱恩的确是问题的症结。他既道貌岸然又假做正经，感到有责任制止公开涉及人类性欲问题的课程。当时，布莱恩总是警惕校园内的道德问题，比如，当1915年一位年轻女人在孩子生父确认程序上指证医学院学生罗伯特·谢尔敦时，布莱恩迅速行动起来，他不进行事实调查，也不等法庭判决，便开除了谢尔敦。在布莱恩看来，仅仅这种性无礼的控告就足以证明是不检

点的了。婚外性生活；毁了一位女人的名誉；而男性被控者又拒绝承担那份光荣的义务。因此，开除就是正当的报答。

布莱恩也用相同的标准衡量一切。萨缪尔·哈丁是历史系的正教授，1916年提出离婚诉讼，布鲁明顿的地方报纸将诉讼作为重要新闻登出来。显然，这是印第安纳大学第一个提出离婚诉讼的教授。起初，布莱恩对此事未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为此感到惋惜和愤慨。然而，他的忍耐是有限的，两年以后，当哈丁再次结婚时，布莱恩接到了当地几位好心人的来信，说哈丁在离婚前就与离婚后的现配偶有过性交往。哈丁知道麻烦来了，他接到布莱恩谴责他的行为的一封信。在抨击哈丁抛妻弃子之后，布莱恩宣称：“你的再婚构成了严重的错误。……对于大学来说，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大学应对它的学生和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推荐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和产生什么样的道德影响。”几星期以后，布莱恩未给他任何辩护的机会，就向董事会提议不再接续哈丁的任命。1918年，哈丁离开了大学。哈丁曾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是位优秀教师和多产的学者，这似乎都无济于事。而布莱尔相当喜欢自1895年就在印第安纳任教的哈丁这个事实也未能左右他的判决。

时间并未放松布莱恩的道德古板。在他任职的最后几年里，他把个人的道德准则强加给周围的人。“做父母官”一直是他对学生采取的政策，而对于教师，他的态度也只是稍稍少一点家长式作风而已。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他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清教徒，一个不敬之词，一杯啤酒，或一个粗鲁的举动，马上就可以使他反感”。这是许多同事对他的看法。当然，布莱恩不可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价值观，但他留下了一道阴影。回顾30年代的气氛，一位善于轻描淡写的教师夫人回忆说，印第安纳大学“威廉·洛威·布莱恩也许由上一代人的理想所统治。”

在时间上看，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控制着美国的性教育。美国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大学课程首见于20年代初，许多是由社会卫生运动资助的。在续后的20年里，这种课程已是许多大学教学大纲上熟悉的部分了。有些确实具有创意，就一些禁忌的话题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如性病，计划生育，和人体解剖。大多数都依照美国社会卫生协会的规定，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传统道德而非防御疾病。集中起来，这些充其量可称作“预防性”课程。它们传播抑制的福音，避免公开讨论人类性欲，而倾向于使用使青年人蒙在鼓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委婉语。

许多卫生官员看着所教的内容，厌恶地摆摆双手。“性卫生主义者，还有他们那些无关的大丽花和生殖力强的蜜蜂的无稽之谈，”一位卫生改革家抢白说，“只把本来神秘的东西弄得更加神秘，结果是更令人迷惑。”这种抱怨不仅限于卫生权威。一位通俗批评家给《美国水星报》撰文说：“在清教的美国，婴儿孕育而生，体面之人只能用已婚抗菌剂交媾，而阴部只能在小巷和医学院里提及。”因此，不管印第安纳大学的卫生课在今天显得多么奇怪，它也许代表了其他大学相同课程的特点。

金赛支持学生进行更加坦白的性教育的要求。随着布莱恩安全的退却和威尔斯支持改革的前景，金赛感到可以利用性教育的机会开展他反对传统道德的私人斗争。当然，他多年来一直非正式地教学生性知识，如在普通生物课上穿插一些性的资料，或与研究生私下讨论性问题。然而，正式的性教育课能给他公开他自己的性道德和性行为的想法提供机会和借口，同时又能受到学术自由的保护。金赛粉墨登场了，他急于把他反对维多利亚道德隐蔽的战争变成为社会接受的公开圣战。他已厌烦沉默地忍受，想要与自孩提时起就折磨着他的性准则作斗争。

金赛抓住时机，主动要求开一门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新课。

1938年春，他在老生物楼的办公室里多次会见女学生会的领袖，讨论改善印第安纳大学性教育课的质量问题。他是一位善于操纵别人按他的吩咐做事的大师，建议女学生会请愿，要求大学提供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课程。

与此同时，金赛展开活动以防这门课程被他人抢走。意识到其他学科也有充分理由开设性教育课，他先入为主，承担了组织这门课程的直接责任。他俨然如负责人一般，邀请心理学系和医学院的同行推荐读物和讨论题目。从政治上看，这是一种精明的作法，使他通过咨询而收买了潜在的对手。此外，他与印第安纳其他学院和大学（和州外的几所学校）的注册官员，询问他们是否开设婚姻课程，并索要教学大纲。金赛还问及这些课程是否在校园引起麻烦，这充分地表明他已为可能出现的反对做好了准备。一些学校的教师透露说他们的确开设了这门课程。金赛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

普渡大学的答复尤其有用。据社会学家O·F·哈尔教授所说，普渡开设婚姻课程已有8年了。其中包括为大龄男女（同堂上课）开设的非学分讲座，不留作业，但提供参考书目，在图书馆里保留22部书供学生阅读。这些都是“最常用的”关于“婚姻和两性混合”的书籍。至于批评，哈尔说有两三位年长教授开始时曾反对，“一位院长私下里找我说，他认为这不明智，认为学院没有理由教导年轻人这些极端个人的事务。”然而，在过去的5年中，这种反对意见消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高年级学生选了这门课，学生们均给予好评。

邻近的弗兰克林学院也传来了颇有教益的消息。教授婚姻课程的小威廉·G·马特尔向金赛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即如何组织一门有许多教师任教的跨学科课程。金赛采纳了他的建议，邀请其他系和其他社区的专家，包括律师、法官、医生等等来讲

课。为避免混乱，马特尔强调有必要让一位教师“主讲，以便确定情感格调”。他解释说：“教师的态度比他所用的材料要重要得多。”金赛认为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了。

克尔加特大学的答复既鼓舞人心又详尽明细。诺曼·E·海姆斯教授透露说，“在这里对这门课程没有反对意见，甚至得到保守派的赞同。”根据他的经验，海姆斯预见，金赛会发现“学生充满感激之情，都通情达理”。海姆斯还推荐让科学家上课，这样的课程在全国已经风行，但这种情况却极其少见。“这种性质的课程在全国发展很快，所以有被怪人或意善才浅之人利用的危险，如果不开辟特殊的教学领地的话。”此外，海姆斯还特别警告金赛不要包括太多的生物知识，最后以他自己的课程为楷模，提出一套教学大纲和推荐读物书单。

金赛的答复是具有揭示意义的，因为它表明他对最近发表的关于人类性欲的文献已进行过仔细阅读。他声称他自己的书斋里就有海姆斯阅读书单上的大部分资料。此外，金赛声称许多年来他一直注视海姆斯在全国母性卫生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是对计划生育等涉及人类性行为的研究给予资助的最大赞助者之一。金赛在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兴趣的同时，热情赞扬了该委员会对这个领域的贡献。

当然，金赛也赞扬了这个委员会对他和印第安纳其他主张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教师的鼓励。“虽然我多年来在教学中接触到人类性行为的问题，”他谈到，“但是，恰恰是母性卫生委员会几年前的工作使我们确信，在这所大学里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涉及到有关婚姻的课程，那就应该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之上的，就应有大量的客观展现的生物学知识。”在续后的一封信中，金赛重申了他要推广生物学知识的决心，尽管海姆斯曾特别警告过他。“谢谢你关于过分强调生物学知识的警告，”金赛写道，“作为生物学